

辑 一

祝贺《聂石樵文集》出版

中华书局 徐俊

尊敬的聂先生、邓先生，各位领导，各位先生：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谨代表中华书局，代表今天与会的书局的同人，对聂石樵先生九十寿辰表示真诚的祝福，聂先生生日快乐！其次，聂先生出于信任，将文集出版任务交由中华书局，我们深感荣幸，也祝贺凝聚了聂先生毕生研究精华的《聂石樵文集》正式出版。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著名学府，更是中国文史学科的重镇，与中华书局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给予中华书局特别多的支持。尤其是古代文学、历史两个学科，以陈垣、钟敬文、白寿彝、启功、何兹全等为主的老一辈先生，与中华书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自1958年起，中华书局成为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出版的专业出版社之后，中华书局与北师大的文史学科合作更为密切。在学术成果出版方面，除了陈垣、钟敬文、白寿彝、启功等先生的重要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外，还有老一代学者如沈兼士、余嘉锡先生的著作。近年北师大文科的中坚学者的著作，由中华书局承担出版的，就更多了，不再一一列举。

北京师范大学在古典文学、古典文献研究领域，一直以来都是国内重要的领先学科，最近十几年，我们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的合作日益深入。其中“典籍”方面，实际就是以启先生、聂先生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学文献研究。

聂先生也是中华书局的老作者，更早的情况我不太了解。30年前，1985年，我所在的文学编辑室就出版了聂先生与邓先生合著的《古代小说戏曲论丛》，记得是赵伯甸责编，启功先生题签，印象很深刻。

2007年，我们出版了聂先生的文学史代表作：《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2008年，出版了《玉谿生诗醇》；2010年，出版了《屈原论稿》《司马迁论稿》；2012年，出版了《古代戏曲小说史略》。

2014年年初，我们与聂先生达成出版文集的共识，除已经出版的七种专著之外，再收录《楚辞新注》《杜甫选集》《宋代诗文选注》三种诗文注释，其他论文则分编为《古代诗文论集》《古代小说戏曲论集》。文集共计12卷，13册。

中华书局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对编辑出版聂先生文集非常重视，文集获得了集团文化发展基金的支持。书局组织了精干的编校力量，因为要赶在聂先生九十寿辰之前出版，排版、校对、编辑、印制的时间非常紧张。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文学院过常宝院长的大力支持，由文学学院的在读研究生承担了《楚辞新注》《杜甫选集》《宋代诗文选注》《古代诗文论集》《古代小说戏曲论集》的两个校次，加快了进度。聂先生文集的全套样书，是前天才样书送审，今天会议用书也是过院长安排，直接到印刷厂，将150套文集运到了学校。所以，要借此机会，对文学院和文学院老师、同学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聂先生文集皇皇12卷，就我肤浅的认识，我觉得聂先生的学术研究，有着他们那一代学人的鲜明特点。简单说就是“贯通”，是贯通之学，不受时代、作家、题材、体裁的局限，面对的是完整的古代文学史、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具备的地方。通过聂先生的文集，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得到这个特点。聂先生的治学领域，以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古代作家研究、作品笺注为主要方向，包括从先秦到清代，从诗歌、散文到戏曲、小说等各种体裁。聂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变做综合考察，同时是建立在文献、文体、文本及史识等学术基础之上，对重要作家和代表作

品，都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考证和辨析。聂先生对《楚辞》、杜诗、李商隐诗等的注释，以古人旧注为基础，并加以补充、校正、钩沉、索隐，引证丰富、论断准确、讲解清晰，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绝非普通的诗文选注本可比。

我们可以说，聂先生在学术传承中，向上是继承了清末民国以来学者传统国学根基深厚、由博返约的学术传统，向下则又为当代学术界培养出了众多的优秀学者，门生弟子，遍及天下。聂先生笔耕不辍，著作丰富，在同辈学者中也是不多见的。聂先生将文集交由中华书局出版，续写了中华书局与北京师范大学长期友好合作的优良传统，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最后，再次恭祝聂先生、邓先生，身体健康，幸福美满。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在座的学者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聂石樵先生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撰述

海南师范大学 阮忠

我认识聂石樵先生，说来已是 30 年前的事了。记得 1985 年端午节，第四次屈原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江陵召开，同时宣布中国屈原学会成立。我那时在咸宁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跟随业师曹善春先生边学习边讲授先秦文学。也是在这期间，我被录取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温洪隆先生先秦两汉文学方向的硕士生，所以那年很积极地去江陵参会。聂先生也去了，很巧，他和温先生同住一个房间，这使我很自然地就认识了聂先生。我那时从鄂南的小城走出来，怯生生的；聂先生话语不多，我则心怀深深的敬畏感。说实在的，聂先生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当时彼此拉的家常，而是他的《楚辞新注》。因为要给学生讲授楚辞，《楚辞新注》便是我案头的常用书。同时，我也读到了先生的《屈原论稿》，以助楚辞的教学。稍晚，我手头又有了聂先生的《司马迁论稿》，常和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同参看。而这都是很久远的事了。

今年四月，幸运地收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寄来的由中华书局 2015 年出版的《聂石樵文集》，使我更全面了解了聂先生的学术成就。聂先生的学术成就诚如广西桂林的王德明兄 2004 年曾在清华大学学报撰文所说，主要有三：一为笺注之作，二为作家专论，三为文学史撰写。三者中，德明兄特别提到了聂先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唐代文学史》，认为文学史撰写是聂先生一生最为辉煌之举。时隔 12 年，现在通观皇皇 12 卷 13 册的《聂石樵文集》，聂先生文学史撰写的成就的确最

为耀眼，出现在文集集中的有《先秦两汉文学史》（上、下），《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唐代文学史》，和德明兄说的相一致。除此，文集中还有《古代戏曲小说史略》，论及元明清三代的戏曲和小说，名为“史略”，终究是史，与先生的宋前文学史一脉相承。聂先生称自己完成的是上中古文学史，虽说少了宋代文学史，却有《宋代诗文选注》对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作品的选注以及对于一些宋代作家作品的解析，可见他对宋代文学的认知。就这些来说，已足以让人感受到聂先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治学精神，或者说先生数十年来的“全副精神意向”，并让读者借此认识聂先生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撰写方法。

一、重具体考析的文学史撰述

聂先生的学术深受其师刘盼遂先生的影响。他在《怀念刘盼遂先生》《古文献学家刘盼遂》等文中谈到刘盼遂先生对学术的看法，其中刘盼遂先生说：“要学业上有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专心致志；第二，要书多；第三，要生活安定。”聂先生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过来的，不畏辛苦，自甘清贫。他曾说：“流光易逝，回首往事，少年鄙钝，于世事都不通晓，及长负笈游学于京师，家贫不足以自给，恒于假期同学皆游乐或回家省亲之时，自己则为学校图书馆钞写目录卡片，以求豁免一学期之学费，困厄凄苦之状难以言表。毕业之后，得执教于高等学校，低薪薄俸，生活仍极清贫，然所教授者为古代文学，乃生平志向所在，因此有条件有机会探求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钻研乎事理，而奋发乎文章，数十年如一日，未曾废辍，以迄于今。已出版之著作若干种，皆在此情况下写成者。”^①这些话说得很沉重，但人生于学术一途，有这样的沉潜方能有所成就也是不庸讳言的。所以聂先生在这条路上得到了其夫人邓魁英先生对他一生只做三件事的评价：教

^① 聂石樵：《唐代文学史·自序》，《聂石樵文集》第3卷，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书、读书、写书。《聂石樵文集》便成为这三件事的结晶。

不过，这样说还不够。聂先生受刘盼遂先生影响的不仅是人生之路，还有学问的途径和方法。聂先生《怀念刘盼遂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关于学习什么，读些什么书，刘先生说：‘第一是经书，第二是史书，第三是小学。这是文史工作者的学问的根，是基础。清代许多大学者没有不治经史的。此外，才是子书百家和其他诗文集子。’先生一直主张文史不分家，认为学文学不学历史是不行的。在学习方法上，先生不赞成我们只搞文学史的一个阶段，主张上下贯通；反对‘白首穷一经’，主张广泛涉猎。”这是刘盼遂先生很重要的学问思想，古来学人治经史没有不治小学的，今来学人治文史也没有不以经史为根本的。而学问之道向来有博、专之说，皓首穷经是为专，广泛涉猎是为博，聂先生遵循刘盼遂先生的教导，走着刘盼遂先生的广博学问之路。

聂先生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我认为学习古典文学首先要有坚实的基础，即扎实的根底。所谓‘坚实的基础’和‘扎实的根底’，即要重点地阅读和掌握一些儒家的经书和史书。……怎样才能读懂古书呢？我认为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其一，必须具备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知识。……其二，必须多读、熟读古代的诗文，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学习古典文学还要以掌握历史知识作为根基呢？这是因为历史是各个朝代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文化思想的实录，而文学作品的内容总是与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紧密联系着，如果不了解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便不可能真正读懂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①这些和刘盼遂先生的学问之道相照应，教育与学术的一脉相承都在其中了。当然，聂先生是转益多师的，他也常提及谭丕谟、李长之、王汝弼、启功等老师对自己的影响。这些为他的学养奠定了基础，也为他的文学史撰写奠定了基础。

聂先生曾提到文学史撰写的两种方法，这是由两种撰写者决定的，一是偏重于具体分析的教学工作者；二是偏重于综合论述的文学评论者。

^① 聂石樵：《漫谈学习古典文学的门径》，《聂石樵文集》第11卷，368～3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前者重以史带论，后者重以论带史，聂先生自认为属于前者。他说：“我撰写文学史与专门从事文学评论者撰写文学史不同，文学评论家撰写文学史，对文学史现象偏重在综合论述，不多作具体分析。我则由于长期教学工作形成之习惯，多着眼于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效果，对作家、作品及文学史之史实、现象重视从具体分析出发，再加以综合论述，得出恰当的评价，使学生在具有感性知识的基础上，达到理性之认识，以免形成概念化倾向，影响学生对知识牢固掌握，其间自然渗透有自己的治学经验和心路历程。”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但我一向以为，这史和被誉“实录”之史的《史记》大有不同。任何人的撰述都不能离开所处的时代，历史或历史感会自然而然地渗入。但“六经皆史”是非自觉为史，实录之史是自觉为史，从而有不同的视角和笔法。史论的落点是论而不是史，重在作者的感受和思想阐述，不宜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实录之史落点是史，重在历史的记叙和事件重现。但文学史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史，它是对历史上作家、作品及文学史史实的再现。这一再现的过程免不了作者对文学过往的重新解读，从而使史中有作者自己的感悟和情怀。这就是聂先生说的“具体分析”，以及撰写文学史时渗透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聂先生曾在《怀念李长之先生》一文中提到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饱含情感，并说李先生“达到情与理融汇无间的境界”。他很欣赏这种境界，从而在自己的文学史撰写中，“心路历程”或者说情感的渗透都很自然。

聂石樵先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来撰写文学史的，他的文学史显然是在践行自己的主张多有具体分析。这在他的《唐代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最为突出。如前者说陈子昂的《感遇诗》其三“苍苍丁零塞”，聂先生对全诗都有解说，我这里取前四句的解说以见一斑。这首诗的前四句写道：“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聂先生写道：“首二句，丁零，种族名，居住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至贝加尔湖以南地带。丁零塞，即丁零人所居之边塞。苍苍，深青色，《庄子》卷一上《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缅，邈远。意谓丁零塞古来即为荒远之地。次二句，亭堠，戍边士兵伺望敌人之所。摧兀，崩颓

不堪。横尸暴骨，皆战争遗留之残败景象。”这样的例子甚多，又如聂先生讲杜甫《江汉》“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存，收养。老马，杜甫自喻。《韩非子》卷七《说林上》：‘管仲、隰朋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意谓应取老马识途之智，不必取长途奔驰之力。张远曰：‘全首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意。’杜甫虽有政治抱负，终不能实现，只有怀恨老死江潭。”这样的逐句解说与分析是先生作为教育工作者撰写文学史的自然流露，却又是他自我理论上的自觉。

聂先生曾说：“长期以来人们不太重视对文学史料进行考证，甚而鄙视之为烦琐。其实这是编写文学史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史料，对众多史料必须辨伪存真，使我们论述的问题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所以，我撰写文学史收集尽可能多的历史文献资料，无论对时代背景、文体渊源，或作家生平、作品真伪，都加以考析，对每一条史料的出处、异文，都进行核证，力图做到无证不信。这些考析不作为注释附于每章之后，而置于正文之中，以便于学生和读者了解怎样得出这一结论来。”^①这番话涉及的问题甚多，就上述两则例子来看，“考析不作为注释附于每章之后，而置于正文之中”，这正是聂先生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方法之一。文学史的撰写并无定法，“考析”总是不可少的，但考析怎样在文学史中呈现则有不同的方式，随文呈现给了读者新的历史面貌。过常宝兄的《建立在模式之外的陈述方式——评聂石樵教授著〈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就说得很好，聂先生对前人评论的援引，营建了另一个层面的历史存在和体验方法。

二、重文学兴衰之迹的文学史撰述

其实，聂石樵先生在这里谈到的文学史写作的“历史文献资料”问题

^① 聂石樵：《我与中国文学史》，《聂石樵文集》第11卷，3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有更深刻的含义。因为他觉得：“研治中国文学史，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尊重文学史之客观发展过程。重史实，重证据，在对历史史实综合分析中，不囿于成说，不囿于传统的看法，作出新的概括。”^①这是文学史撰写的两个面，一面是在尊重历史中继承，另一面是在尊重历史中创新。在人们的心目中，聂先生是朴实的人，他的学问和他为人一样，撰写的文学史同样有朴实的风格。这来自于他把文学史建立在“历史文献资料”之上，走向求实的史学之路。聂先生在1978年对自己过往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有些反思，他说：“重新认识到评述古代文学只能实事求是，一切从文学史的客观实际出发，重史实，重证据，用事实说明问题，尊重文学史辩证的发展过程，不能从主观愿望、理论模式出发，更不能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经验证明，那样做只能歪曲文学史，并非‘古为今用’，不能达到述古鉴今的目的。”^②聂先生这番话很有意味，历史不应当任人打扮，文学史亦然。一旦任人打扮，“史”就走样变形了，何能称“史”呢？

在文学史撰写上，“实事求是”是聂先生的执着追求。“重史实，重证据”，是要摒弃空谈理论，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事实或者说过往的文学、文学现象做客观的评价。聂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史自序》里还说了一句话：“搜览资料务求翔实，铨评史实务求确当，祛臧否偏私之见，存文学史实之真。”这句话包括了史料、史实和史识三个方面的内容。这样说来，聂先生其实树立了相当高的文学史撰写原则，均不易做到却又不妨碍他这样做。类似的话聂先生在为他的学生、湖南郭建勋兄写的《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序》里也说过：“一部好的文学史，必须建立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丰富资料认真审理的基础之上。缺乏对丰富资料的综合分析、论证，不但文学史思想体系构建不起来，而且对作家作品也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要言之，资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这就能够解

① 聂石樵：《关于中国文学史中之若干问题》，《聂石樵文集》第11卷，3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② 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自序》，《聂石樵文集》第1卷，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释聂先生为什么在文学史撰写中尤其重视“历史文献”了，他要以此建构自己的文学史思想体系。

聂先生的文学史思想体系大体上是建立在“朝代”基础上的，他认为不以朝代为框架会影响年代上的混乱。尽管也有特例，这就是他把秦置于战国之后，把隋置于南朝之后。因为聂先生认为秦文学是战国文学的附庸，隋文学是南朝文学的因袭，二者均无创造。这一点聂先生在《我与中国文学史》一文中也说过。然而，以朝代为文学史构架是历史的自然，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无论是通史还是分体史，多以朝代为发展阶段。这样的划分虽然与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但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并不平衡，所以这种一致性不一定与文学发展的水平相吻合。不过，聂先生的文学史框架还有他自觉的选择，这就是从文体切入，从而在文学史撰写上构成两条纵线或说经线：时代的与文体的。这也许是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史撰述的传统。别的不说，先于聂先生文学史的有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在时代的框架之下，也以不同的文体来贯穿；其后郭预衡先生和郭英德兄联袂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亦然。郭预衡先生曾说不希望把中国散文史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这大概是重历史文献的文学史撰写者应该高度重视的。聂先生的文学史并没有给我们“文学史资料长编”的感觉，但他以丰富的历史文献作为文学史撰写的基础也是很有必要的。

和一般文学史把起点置于有史以来的夏朝不一样，聂先生把文学的起点放在上古伏羲时代，《先秦两汉文学史》第一章“上古传疑之文学”就以伏羲开篇，然后及神农、黄帝、尧、舜。聂先生在这里的撰述，意在“辨伪存真，探赜索隐，以见文学萌生之路”。这无疑是把文学发生的时间前移了，也成为本书的亮点之一。自夏朝之后，聂先生的文学史就遵循朝代与文体的双线撰写，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夏代文学中的散文、韵文，商代文学中的散文、韵文等。春秋战国之际，聂先生又注意到不同的思想流派，从而打破了一般文学史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的套路。例如，在东周文学里，第二节“儒家经传中之散文与韵文”，涉及《周易》《礼》《乐》《春秋》《论语》《左传》《国语》《公羊传》和《穀梁传》。虽说儒家经典的形成

得力于汉以后朝野的认同，但在文学史的撰写中，这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编排方式。它们彼此各有风格须当别论，但思想家的议论之文与历史家的记叙之文终究同属于散文，文体没有削弱而同时兼顾了思想流派。聂先生这种编排方式其后仍在延续，如西汉文学，同一章中有辞赋、散文（新诸子之文、历史散文）、诗歌。到了魏晋南北朝，不像西汉有前期、承前启后及后期之分，诗歌、乐府（乐府因文体的特殊性独立于诗歌之外了）、赋、骈文都依各体贯穿始终。唐代文学史亦然。

聂先生曾说：“一部好的文学史，应当厘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过程，厘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演变趋向，以见文学兴衰之迹。”^①从朝代和文体的角度总领文学史撰写，只是一个基本的构架，聂先生是要从中看到文学兴衰之迹的。他说：“我按照不同的文学体裁分别探讨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如对五言、七言诗产生之考稽，对汉赋、骈文、律诗的形成及其演变的论述等。在不同文体范畴之内再分别说明某作家之文风源于何人，形成何种流派，如对玄言诗、对偶诗、山水诗之论述，以显现其发展线索、脉络之清晰。”^②聂先生在这里言及的内容很丰富，如他说的“对五言、七言诗产生之考稽”，见于《先秦两汉文学史》第七章“西汉之文学”中的“五言、七言诗之起源”，其中七言诗之起源尤其值得关注。聂先生先引顾炎武、沈德潜说以见七言诗之产生始于《三百篇》《神女赋》《灵枢经》中的七言句，但又认为，七言单句的出现对七言诗的产生有影响，但不是七言诗的起源。他说：“作为一种诗体，我们考察它之起源，必须以通篇七言为准。”从而从三个方面做了探讨：一是西汉的七言镜铭，二是西汉的七言字书，三是西汉的七言谚谣。这些都起于民间，而且有通俗、浅显的文风。到了东汉才有了文人七言诗的出现，如张衡的《四愁诗》等。最后聂先生的结论是：“七言诗萌生于西汉，形成于东汉。”其作者先是下层百姓，后方为文人学子。这样的考稽文字，我们常

① 聂石樵：《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序》，《聂石樵文集》第11卷，5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② 聂石樵：《我与中国文学史》，《聂石樵文集》第11卷，3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在聂先生的文学史中看到。

不仅如此，又如聂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里说的：“汉末华丽、对偶之文与优厚、丰实之学风相融汇，形成了建安文学之新风貌，即由汉诗之质胜于文之旧文风转变为文质相称、情采并茂之新文风。”这是建安文学，稍后，聂先生说正始文学在司马氏剪除曹魏、排除异己的“黑暗恐怖之政治环境中，一般文士都畏祸忧生，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而幽伤痛苦。为了寻求解脱，便产生了一种超脱现实之念头，思想上逐渐趋向老庄，所写之诗歌，多带玄言意味，所谓‘诗杂仙心’，玄言诗因之发展起来”。再往后的西晋太康时期，“一般文人士子之生活也比较安逸、富裕，内心无任何隐痛与创伤。这影响于文学创作，则大变建安之风骨与正始之清峻，而产生‘采缙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之多藻饰之功，而乏深邃之意的太康文学”。聂先生这些文字都很简洁，不多的话语透出的果真是“文学兴衰之迹”。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先生更关注的是相应的作家作品有怎样的表现，以印证文学怎样“兴”和怎样“衰”，无不贯穿着聂先生特别在意的“史识”。这一点，在聂先生的文学史中俯拾皆是，不必一一列举。他曾说：“一部好的文学史，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史料和对文学的历史叙述，更重要的应当有史的观念，有史的论断，即有史识。”^①可见史识比史料更可贵。他自己在努力这样做，让人感受到他对文学发展的兴衰有诸多独特见解。

三、重以史证诗及文学流派的文学史撰述

聂石樵先生还说过：“我在讲授或撰写文学史时，重视对一个时代社会环境的论述，从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诸方面说明此期某一种文学体裁、文学风格、文学流派和文人集团之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原因，并将这些论述与当时的文学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地说明某些文学现

^① 聂石樵：《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序》，《聂石樵文集》第11卷，5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象的产生，乃历史发展之必然。”^①这是他重文学发展兴衰之迹的表述。而这里要说的是，文学或文学现象与社会诸多方面的关联是难以割裂的，怎样把握始终是摆在文学史撰写者面前的问题。聂先生在文学史撰写中，依循旧例首章通常是说社会环境，如他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首章写“汉末魏晋南北朝文学形成之社会环境”，《唐代文学史》首章是“唐代文学之社会环境”。前者四节分别为士族制度之确立、学术思想之冲突、声律之产生和文、笔、言之区分；后者四节分别是经济之恢复与发展、扩边战争与东西文化交流、科举制度之影响、宗教与哲学。聂先生的论述通常要言不烦，他所考虑的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并非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而是与文学最相关联的文化因素。这当然只是聂先生重以史证诗的一个方面，更多地还是体现在他的作家作品论当中。

所以聂先生会在叙及作家作品时，很自然叙及作家的人生经历，这一点，是一般文学史也常做的事。但聂先生随后不再像一般文学史那样说某某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影响，而是直接进入该作家的作品中，从而彰显其文学史的作品中心，这一点过常宝兄在《建立在模式之外的陈述方式——评聂石樵教授著〈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说，无须赘言。具体来说聂先生的作品论析，如论唐代诗人高适，先后言及的诗是《封丘作》《燕歌行》《人日寄杜拾遗》《塞上听吹笛》等。有人说，聂先生学术的突出成就在考辨上，这些考辨在聂先生的《楚辞新注》《玉谿生诗醇》《杜甫选集》等作中有集中的体现，而文学史中的考辨通常是在作家作品的论析中。例如，在《燕歌行》中，他说“张公”即张守珪，引述了《旧唐书》的《玄宗本纪》《张守珪传》中所载；说“男儿本自重横行”的“横行”，引述了《史记》卷一百《季布传》的“横行匈奴中”；说“校尉羽书飞瀚海”中的“校尉”，引述了《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中的“校尉”诸说。而这些涉及聂先生文学史的两点：一是以史证诗，二是重文学流派。

^① 聂石樵：《我与中国文学史》，《聂石樵文集》第11卷，379～3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关于以史证诗，聂先生是这样说的，我撰写文学史采取以史证诗的方法，以求对作品的内容更深一层的理解。又如讲授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主，还是以考稽文学源流为主？我采用的是前者，一部文学史好像一部作家作品论。实则这是一种偏颇。我国传统的修史原则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才是我们应当遵循的。^①“以史证诗”，具体说来是诗的解读方法，当然也可以成为辞赋、古文、戏曲等的解读方法。但限于不同文体的特征，在聂先生的文学史撰述中主要还是体现在诗歌上。聂先生说 he 倾向于传统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要让所解读的作品回到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这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通过史料揭示作品的内涵，另一个是揭示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前者的方法在文学批评史上，自孟子提出来之后，两千多年来可谓是经典的批评方法，固然传统、老套，却至今少有文学批评者能脱其路数。后者的意义其实是在于文学史上的位置和由此产生的历史关联性。这与我随后要说的聂先生重文学流派有关。

2010年，聂先生在答过常宝兄关于“以史证诗”问时说：“这种编写文学史的方法要花些笨工夫，要大量阅读材料，不然只能人云亦云，或者随意编造。”他还引了对曹植《名都篇》的解读为例，说明是在怎样追求做到“无征不信”的。常宝兄就此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怎么看待文学史中存在的这么多考证？这么多的考证不置于文外以注释或附录的形式出现，而在随文成为正文的一部分，有可能会导行文的烦琐和滞碍。但这正是聂先生文学史由“推敲、琢磨”形成的特色之一，是与他数十年的教学习惯和风格相联系的，需要读者正确地面对：文学史撰写虽有规律可循，但它也应属于有法而无定法之列，不同的撰写方式呈现出来的不同风格，完全是可以兼包并蓄的。所以聂先生在文学史中不惮其烦地解读杜甫的《楼上》《诸将》等，解读李商隐的《隋宫》《齐宫词》等，并说李诗是对杜律的继承和开拓。同时，聂先生说李商隐的古诗多是拟杜之作，

^① 参见聂石樵：《我与中国文学史》，《聂石樵文集》第11卷，3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也是看到了杜诗对李诗的深远影响。当然，以史证诗，诗亦为史，它们构成文学史环环相扣的链条，又体现在生生不息的文学流派中。

关于文学流派。聂先生很想把文学史的演变过程讲清楚，所以他特别重视文学的兴衰之迹。文学史研究关乎作家作品，对作家作品的考辨与分析，我们不仅希望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还希望放在作家所有的作品中、放在当时的文学氛围中、放在作家的生平中，甚至是放在后人所有的评述中进行审视，这样也许能够对该作品有更贴近本色的评价。这方面又涉及对作家作品的考辨，不拟多述。我想再略说一下文学流派与风格，以见聂先生的文学整体观。例如，聂先生认为盛唐诗歌有四派，李白源于陈子昂，属怀古咏怀派。他在考辨分析了李白的《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其十四“胡关饶风沙”，其十九“西上莲花山”，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和《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之后说道：“李白之咏怀古诗在体裁上与阮籍之《咏怀》、陈子昂之《感遇》一脉相承。但在风格上又与《楚辞》相似，如其驰骋想象，神游天界，总览四海，囊括古今等景象，都有《离骚》《远游》诸作之遗迹在。”随之聂先生先后考辨了李白的《蜀道难》、《长干行二首》其一、《战城南》等，评价李白的乐府有一部分在体格、声调上有楚人诗风；另一部分乐府则出自汉乐府，在体裁、题材、语言等方面有汉民间乐府的韵味。从而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李白的诗因其流派而在文学史上不是孤立的存在。

又如他说中唐诗歌都是在杜甫影响下发展的，有韩愈等人的重锤炼而追求诗歌的“奇险冷僻”，有白居易等人的不泥古调，就现实题材的即事名篇，各为一派。他们的诗歌在流传中，虽然发生了变异，但流派的自觉仍然存在。例如，韩派的孟郊没有韩诗的豪放，而表现为韩愈所说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韩派的李贺有韩孟的险怪，却又有古乐府的朴华和齐梁宫体诗的秾艳。而从中唐诗说到晚唐，有李商隐承韩派，他所造就的形式精美、情感真挚的诗却又成为北宋西昆体的先驱。聂先生重文学流派当然不只在诗歌领域，他说文、说赋、说小说、说戏曲亦然。例如，他说唐代散文，是在四六文走向僵化的时候兴起，初唐有傅奕、吕才和陈子昂的散文，成为“唐代古文运动之先导”；继之有萧颖士、